

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现存抄本版本源流考述

戴琳琳

内容摘要:作为南宋福建书肆编刻的专门性四六类书,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是反映宋代骈文风貌与创作生态的重要著作。该书宋刻本已佚;现存五部明抄本虽底本各异,但源出同一祖本,可归为两种传抄系统:系统一包括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辽图本,系统二包括浙图本、国图本。两个系统在传抄过程中,还曾存在多个其他抄本。在现存抄本中,较为通行的上图本实为伪名人抄本,且文本问题较多;浙图本的文本错误较少,也更接近推测中的宋刻本面貌,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。

关键词: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 四六类书 明抄本 版本源流

南宋叶蕢^①编纂的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(以下简称“《四六丛珠》”)是一部专门性四六类书,全书有百卷之巨,如书前吴奂然序言所称:“《四六丛珠》告成于书局,予观其翻缉之工,科别之明,盖自鼇扉之腾奏、鳞幅之往来、宾嘉之成礼、释老之余用,凡百僚之冗、万绪之繁,莫不班班具在。”^②该书结构详细、门类繁多,存录宋人篇章、偶句甚著,不仅反映出当时的四六创作需求与书坊编纂风气,保存了一大批南宋佚文^③,还在明代衍生出颇为风行的节选本,是探讨宋代骈文创作生态、南宋福建书肆编

①关于此书编者,宋刻本《播芳大全》署作“叶棻”,明抄本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都署作“叶蕢”,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论。考虑名和字之间的联系,以“蕢”为是。叶蕢,字子实,建安(今福建建阳)人,祖籍南阳(今河南南阳)。

②吴奂然:《四六丛珠序》,叶蕢编: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卷首,浙江图书馆藏明抄本(索书号:善 000226)。

③详参戴琳琳:《〈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〉所存佚文辑考》,《新宋学》第十一辑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23年,第231—289页。

集、宋明四六类书变化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材料^①。可惜此书宋刻本不存,最易获取的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影印自上海图书馆藏伪题王宠、王阳抄本,讹误较多、字迹难辨,利用效果不佳;现存其他抄本则散见于各地,文本情况复杂,关系有待梳理。因此,本文逐一考述《四六丛珠》现存抄本,梳理其版本源流,并评较优劣,以便学界能更好地利用这一文献展开研究。

一、《四六丛珠》现存抄本述要

《四六丛珠》约成书于南宋庆元二年(1196)^②,刻于建安陈彦甫家塾,原刊本已不存世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《四六丛珠》现存明抄本八部,清抄本一部^③,然经笔者目验,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(索书号:16176)、清抄本(索书号:A00754),天一阁博物院藏卧云山房本(索书号:善4684)、天一阁本(索书号:善4587)乃节选本,今存《四六丛珠》全本抄本仅有五部,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(索书号:线善750143-74,以下简称“上图本”)、日本静嘉堂文库(一二函四八架,以下简称“静嘉堂本”)、辽宁省图书馆(索书号:善60025,以下简称“辽图本”)、浙江图书馆(索书

①施懿超(《试论宋代四六类专门性类书》,《四川图书馆学报》2004年第6期,第71—76页;《宋四六论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195—201页;《宋代类书类四六文叙录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7年第3期,第8—14页)较早地从骈文研究的视角关注到此书,具有开拓性意义。张澜(《中国古代类书的文学观念: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〉与〈古今图书集成〉》,九州出版社,2013年)、侯体健(《四六类书的知识世界与晚宋骈文程式化》,《文艺研究》2018年第8期,第58—66页)、周剑之(《黼黻之美:宋代骈文的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1年)、张敏(《宋代奏议的文体新变与文化意涵研究》,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[刘明华指导],2021年)、陶熠(《由文病到污名:宋元时代骈文“类俳”观念的嬗变》,《新宋学》第十一辑,第169—181页)等亦在骈文议题中论及《四六丛珠》。王琼(《宋代贻见类启文研究》,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[沈如泉指导],2019年)从启文研究的角度讨论此书。其他研究亦有从类书、刻书业等角度关涉《四六丛珠》者,兹不赘述。总之,《四六丛珠》在此前已经获得学界的不少关注,但其较为复杂的版本情况尚未被厘清。

②书前吴奂然序称“《四六丛珠》告成于书局”,则《四六丛珠》刊成时间应与作序时间相近。序文落款时间为“庆元丙辰九日”,“庆元丙辰”即宋宁宗庆元二年。

③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子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807—808页。

号:善 000226,以下简称“浙图本”)及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12894,以下简称“国图本”)。下面就各抄本情况分别论述。

(一)上图本

上图本《四六丛珠》一百卷,因被影印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是目前最易见的抄本。其目录部分独立成册,每半叶10行,版心上方刻“兰台法鉴录”,蓝格,白口,四周双边,首叶钤有“沅叔借观”白文方印,末有“建安陈彦甫/刻梓于家塾”双行刊记及“苕伯”白文方印。正文每半叶10~14行,行20~25字。每卷中的门类、细目及“总说”“故事”“四六”大字占双行,用无格稿纸抄写。卷前有傅增湘跋语,末题“岁在辛巳孟冬江安傅增湘书于企麟轩”,跋前钤有“读易楼”朱文长方印、“藏园题识”朱文方印,跋后有“傅增湘”朱文方印、“癸卯馆元”白文方印;其次为庆元二年吴奂然序;再次为王宠跋(伪作,说详下文),末题“嘉靖壬辰嘉平月雅宜山人王宠附记”,后钤“雅宜山人”朱文方印、“王宠之印”白文方印;卷末有王季烈跋,题“岁在强圉赤奋若仲春之月螾庐王季烈题”,跋前有“而语不慕荣利”白文长方印,跋后有“王季烈印”“螾庐”白文方印。

此本卷前王宠跋文向来被视作明代书法名家王宠的真迹,上图本也因此被认为是王宠、王阳等人之抄本。但实际该跋曾被傅增湘判伪,只是由于傅氏本人前后说法不同,这一观点并未被学界重视。在上图本卷前跋语中,傅增湘道:“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一百卷,明雅宜山人家中写本。据山人手跋言,自吴从明宗丞家假得宋刊本,命儿女辈分钞,以为日课。得暇亦欣然自书,雪案萤窗,暝摹晨写。诗书夙好,翰墨怡情。风雅萃于一门,卷帙长留天地。清标逸韵,展卷之余,为慨慕者久之。”特别指出王宠的参与,并称扬该抄本“清标逸韵”,不同凡本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则著录:“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一百卷(宋建安叶菜子实编)。明写本,十四行二十五字,每门类大字标题占双行。目后有‘建安陈彦甫刻梓于家塾’二行。首有庆元丙辰九日锦溪吴奂然景仲序。有明王宠手跋,录后……(翰文斋送阅。癸亥)。”^①亦以王宠手跋为真。然而在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中,傅增湘又揭其为伪跋:“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一百卷,宋叶菜编。明写本,十四行二十四字。目录又以他本配入。前庆元丙辰吴

^①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八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526—1527页。

免然序。又有伪王宠跋。翰文斋送阅,以借校渠所藏他书,勉为一跋。”^①直言卷前王宠跋语为伪,并提到目录“以他本配入”,但未多作说明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和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都提到该本由“翰文斋送阅”,可知是同一部。翰文斋为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东街上一旧书店,可以想见,此本乃书商送请傅增湘阅览并索跋,或是碍于情面“勉为一跋”,或是有限时间内未及深究,总之,傅增湘并未道出判断王宠跋语为伪的缘由。

此书目录一册版心位置磨损严重,在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中,原书样貌已无法准确展现,笔者目验上图原本,发现该跋实写于版心上方题有“兰台法鉴录”的稿纸之上,而该题正可坐实王宠跋语为伪作。

遍检目录及现存文献,题“兰台法鉴录”者仅见明何出光、陈登云等人所撰一种,书前有孙丕扬、褚铤两篇序文。孙序云:“万历前无录,岁己丑,御史扶沟何君(名出光)始草创之,唐山陈君(名登云)、长洲徐君(名申)相与搜罗之。安邑陈君(名遇文)、贵溪毕君(名三才)辈又润色之。迄丁酉录成,且剞劂告竣[竣],乃问叙于我。”褚序云:“顾各道只有题名,未有萃而为录者。万历己丑岁,扶沟中寰何君代狩恒山,创为《法鉴》一书。”^②孙、褚二人历官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,皆以御史经历闻名,所作两序都明确指出《兰台法鉴录》为万历十七年(己丑,1589)何出光首创,万历前各道御史仅有题名,没有编成名录的先例。据叶向高《明贵州道监察御史何公墓志铭》载,何出光“以万历丁酉十二月初一日终,距生嘉靖丙午三月二十日,得年五十有二”^③,可知其生于嘉靖二十五年(丙午,1546)。而作为明代吴门书派代表之一的王宠,嘉靖十二年就已离世,其所撰之跋自然不可能写在题有何出光所编《兰台法鉴录》的稿纸之上。因此,上图本卷前的王宠跋语系伪作。除了稿纸证伪以外,此跋的题款与印章也存在疑点。题款中“宠”字部首“宀”缺笔作“宀”,与以往被认为

①莫友芝撰,傅增湘订补,傅熹年整理: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1528—1529页。

②《兰台法鉴录》先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刊行二十卷本,后于崇祯四年(1631)续刻为二十三卷本。二本中均有孙、褚二人序文。今据国家图书馆藏续刻本(索书号:15275)引述序文。

③何出光:《中寰集》卷十一,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四年(1606)扶沟何氏刊本(索书号:A01730),叶三。

是王宠真迹的款识都不同。王宠真迹的题款中常将“宜”写作“冝”，伪造者或是以此类推。跋语后所钤“王宠之印”（见图1）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《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轺车齐发敬呈四首》



图1



图2

《辛巳书事诗七首》《绿荫草堂图》等王宠真迹上钤盖的“王宠之印”（见图2）白文方印不同，前者印文每字均等，“王”“宠”二字刀法刻板，后者印面上方的“王”“之”二字均明显小于下方的“宠”“印”二字，布局疏密有度，刻划拙趣盎然；“雅宜山人”朱文方印与天津博物馆藏《西苑诗》后的王宠“雅宜山人”白文方印相比，仿刻痕迹明显，特别是“人”字笔画疏细，形似而无神韵，故疑两印为伪^①。

王宠的书法在明代已有许多贋本，与之时代相近的张凤翼就曾形容当时“贋书盈市”^②，该书现存的卷前题王宠跋语残损，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过录其文^③，跋语称此抄本是王宠子王阳、女王塚等作为每日字课抄写而成，王宠也参与其中。王宠小楷神韵超逸，不易模仿，以“儿女子辈钞之，以作每日字课”解释卷中字迹不一、风格与王宠似像不像，不失为绝佳理由。跋语既伪，所谓“儿女子辈钞之”的说法亦不可信。然从书中的字体风格和纸张来看，尚无其他证据可以推翻该本为明抄本的旧有断代结论。

（二）静嘉堂本

静嘉堂本《四六丛珠》一百卷，为陆心源韶宋楼旧藏，《韶宋楼藏书志》著录：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一百卷。旧抄本，兼牧堂旧藏。”^④书中所夹旧题签题作“抄本四六丛珠”。目录部分单独成册，每半叶9行，末有“建安陈彦甫/刻梓于家塾”双行刊记；正文部分每半叶12行，行24字，用无格稿纸抄写，每卷中的门类、细目及“总说”“故事”“四六”大字占双行。卷首钤有“篁庵氏”白文方印、“谦牧堂藏书记”白文方印、“静嘉堂珍

①陈先行曾撰文指出，多部宋元本上钤有王宠伪印，乃后人为增强买家信任度、提高抄本价值而作（详参陈先行：《古籍善本（修订版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152—158页）。

②张凤翼：《题王履吉手书选诗卷后》，《处实堂集》卷七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35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355页。

③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八，第1527页。

④陆心源著，冯惠民整理：《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617页。

藏”朱文长方印,卷末有“兼牧堂书画记”朱文方印,卷五一有“沈炜”朱文方印、“明卿”白文连珠印。其中,“篁庵氏”为明罗宪汶之印,“谦牧堂藏书记”与“兼牧堂书画记”为清揆叙之印,“沈炜”“明卿”为沈炜^①之印。

(三) 辽图本

辽图本《四六丛珠》一百卷,目录部分单独成册,每半叶9行,正文部分每半叶9行,每行大字21字,小字双行21~25字不等。蓝格,白口,四周双边,版心上方刻“四六丛珠”。每册卷首有“见山堂藏书印”朱文方印,“东北图书馆所藏善本”朱文方印,目录首叶有查嗣琛“檀浦嗣琛之章”白文方印,第六册末尾“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之二十六”下题“见山堂藏书”,并跋“是书得于历下,惜其体例尚未尽善,然其取材亦宏矣”,无落款。跋中提及的“历下”在今山东省济南市西,可知此书曾于山东流传。然“见山堂”所属何人,尚难遽定。罗振常《善本书所见录》著录:“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一百卷。明抄,蓝格棉纸。宋建安叶蕢子实编。前有庆元丙辰吴鱼然序。每类后有四六对举之句。有‘见山堂藏书印’(朱方)。”^②当即此部。《四库未收书提要》中载《四六丛珠》提要云:“《四六丛珠》一百卷。宋叶菜撰,即是撰《播芳文粹》者。《文粹》间有传抄之本,是书罕见。《四库全书》存目内只载明王明整等《四六丛珠汇选》十卷,此则明初蓝格抄本,尚是当时原帙也。”^③提要中称“蓝格抄本”,今存《四六丛珠》全本仅辽图本符合该描述,疑即阮元所见本。此外,该书卷二七叶一有“复初斋”朱文长方印(见图3),“复初斋”为翁方纲的斋号,但该印章与翁方纲行书轴钤印(见图4)^④不同,其中“初”字的部首“礻”亦刻

①沈炜,字明卿,生卒年不详。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双璧陈氏刊本《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前集》卷内钤有“沈明卿印”等印记,其中的“沈明卿印”疑与此“沈炜”“明卿”二印同属一人。需要说明的是,此沈炜非明嘉靖二十年(1541)状元沈坤之父沈炜,据沈坤好友吴承恩所作《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公墓志铭》(吴承恩:《射阳先生存稿》,南京图书馆藏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铅印本,索书号:GJ/808689,叶十三至十四)可知,沈坤父沈炜字文盛,号卓亭,与此处字明卿的沈炜非为一人。

②罗振常撰,汪柏江、方俞明整理:《善本书所见录》卷三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年,第119页。按,“鱼”当作“兔”。

③阮元:《四库未收书提要》附录,上海图书馆藏管庭芬校本(索书号:线善787636),叶六。

④上海博物馆编: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,文物出版社,1987年,第784页。

错,疑其为书估所造伪印。此书可能曾以翁方纲经藏的噱头在书市上流通。

(四)浙图本

浙图本《四六丛珠》一百卷,为范钦天一阁流出的旧藏,书中所夹旧题签题作“四六丛珠”。卷首钤有“四明范氏图书记”朱文长方印、“司马之章”



图3



图4

白文方印,皆为范钦藏印。此本目录部分单独成册,所载目录行款不一:“书籍目”“文集目”“名贤目”三种目录每半叶10行;“门类目”大字占双行,每半叶5行;“细目”每半叶11行,末有“建安陈彦甫/刻梓于家塾”双行刊记。正文部分每五卷为一册,共20册,每半叶14行,行25字,用无格稿纸抄写。此本由多人抄录,质量不一,其中目录、第1册(卷一至卷五)、第18册(卷八五至卷九十)似出自同一人之手,抄写极为精美,用明代流行的“台阁体”书写,部分大字有意模仿建刻本字体风格。

(五)国图本

国图本《四六丛珠》为残本,存卷一至卷十、卷三九至卷一百,共七十二卷,并附目录一卷。此本行款与浙图本相同,白口,四周单边。纸面可见原有界栏痕迹(见目录叶四十四、卷七叶八、卷九八叶八等处),每半叶11行,推测抄纸版片上的界栏为人剝去,故成纸后仍有部分残留。从抄纸来看,这种上下白口的印纸为明中后期流行的仿宋版式,故该本的抄写年代可能在正德之后。该本卷前有陈仲勉节录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内容,并跋:

此集为明人钞本,书估云为十余年前与天一阁藏书同时散出,盖即范氏旧藏者也,惜第十一卷至三十八卷于售出时为他人误取去。年来兵戈不息,善本日稀,皕宋所藏已归日人岩崎氏。此虽残帙,亦弥足珍矣。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仲勉记。

跋下钤有“陈仁懋”(仲勉之字)朱文方印。由陈跋可知,该本为范钦天一阁散出旧藏,散出时原为全本,在书商售卖时被人误取去二十八卷,才成今日残本面貌。

二、《四六丛珠》现存抄本系统

经由以上考述可以发现,在现存五部《四六丛珠》明抄本中,除了序跋、钤印等提供的一些递藏信息外,能够从其外部特征中获得的信息十分

有限;检核各抄本中的文字,亦无避讳现象能够辅助判断。故而对于《四六丛珠》抄本系统的梳理,不得不将目光聚焦到文本内部。但是,抄本的文本流传较刻本的情况更为复杂,对于同一抄本中文本来源的同一性如何保证、不同抄本中文本来源的一致性如何判定等问题,目前还缺乏成熟的方法。因此,下文仅在假设同一抄本中文本来源一致的前提下展开,依靠关键性异文等要素判别文本来源,同时尽可能在比勘时扩大文本范围,以减少抄本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。

由异文判断,《四六丛珠》的五部明抄本可细分为两个系统:系统一包括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辽图本,系统二包括浙图本、国图本。下文分述之。

(一) 系统一(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辽图本)

1. 上图本、静嘉堂本具有同源性

上图本中存在不少讹夺衍倒的情况,这虽然对文本质量有所影响,却为区分抄本系统提供了许多关键信息。比勘上图本与静嘉堂本,有多处特别的讹误如出一辙,指示出它们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。

上图本与静嘉堂本中存在多处相同的错叶现象。上图本目录叶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,原序应为叶四十四、叶四十三、叶四十二,这一错叶导致“细目”中卷七四“诸式”与卷七五“式”中的条目顺序颠倒:本应置于卷七四开头的“谢宣问奏状式”至“转官谢上位状式”共 29 种被错置于卷七五的末尾;应在卷七四中间部分的“转官谢平交状式”至“回任谢远迎状式”共 28 种被错置于卷七五中;应在卷七四末尾的“回任经由州县远迎状式”至“双封外封皮式”共 15 种则前置于该卷卷首。静嘉堂本目录存在同样的讹误,但错位的三部分条目却并非同上图本一样各自分布在独立的一叶,而是与前后条目居于同叶,显然为错叶发生之后的抄本。而除了“细目”中的错叶外,上图本应属卷六“改元”“元会”条中的两叶错入卷十七“贺启头”条中;应属卷十五“赐文字”“谢赐历日”条中的一叶错入卷十四“到任”条中。静嘉堂本对应文本的情况都与之相同,且错置部分亦与前后文抄于同叶。并且,在卷十五“赐文字”条脱叶位置之后的一叶上,上图本在叶端以小字抄写了“谢赐历日”这一书耳文字,静嘉堂本的抄手大概本拟略过不录,却发现分属不同条目的两个四六全篇接续排布,于是又将“谢赐历日”小字补写在两行之间。上述现象证明静嘉堂本(或其底本)与上图本之间存在相关性。

此外,上图本与静嘉堂本还有多处一致的错抄、漏抄。如卷四六“车辂院”条,本应在同卷“御辇院”条后,却被误抄于“诸库酒务”条中;卷五三“漕使”条中脱“减孔祭酒,能令流徒之归。意之所欣,言且弗尽”句;卷八四“答问亲”条中的《答王氏问亲书》正文误抄入同卷“求婚”条中的《求婚书》的正文,并在“求婚”条中缺录该篇《求婚书》;卷八四“过定”条中的《定书》正文漏抄“摽有梅……”一则等,这些现象无不指向上图本与静嘉堂本之间密切的同源关系。

尽管如此,静嘉堂本与上图本并不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。其一,静嘉堂本卷四一“正言”条中误录本属于卷九五“圣节大燕”条中的摘句^①,共占二十行。这部分误录文本在上图本中则被漏抄,且误录文本的前后文在上图本中正好分属前后叶,结合上图本行款与其他《四六丛珠》抄本来看,漏抄内容在上图本中应该恰好为一叶。因上图本中没有对应文本,可知其并非静嘉堂本所据底本。其二,上图本卷五四叶四 a 与叶四 b 文本抄写顺序颠倒,导致“提舶”条中有半叶的摘句被抄入本条的四六全篇当中。而静嘉堂本对应文本并未错抄。其三,上图本和静嘉堂本的卷九“祥瑞”条中,有部分故事、摘句前有用以指示分隔的墨圈“○”,上图本有 21 处,静嘉堂本有 20 处,其中有 3 处位置各不相同。其四,二本缺文情况各不相同。上图本的文本总体比静嘉堂本更加完整,然亦有上图本缺文而静嘉堂本完整无缺的。如上图本卷五“明堂”条摘句“从□□□□”,静嘉堂本作“从骅牡以享”;上图本卷四十“谏议大夫”条摘句“君□之道焉可诬”,静嘉堂本作“君子之道焉可诬”等。总之,上图本与静嘉堂本互有异文,可知二者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。

2. 辽图本与上图本、静嘉堂本具有同源性,且与静嘉堂本关系更近

辽图本中存在不少与上图本、静嘉堂本情况一致的漏抄、错抄现象,如卷十四“到任”条中,辽图本中同样错入卷十五“赐文字”“谢赐历日”条中的部分文本;卷十七“贺启头”条中,辽图本中也错入卷六“改元”“元会”条的部分文本;卷五三“漕使”条漏抄句等,都与上图本、静嘉堂本别无二致,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。

不过比起上图本,辽图本中的一些迹象显示其与静嘉堂本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。如三本卷一叶二叶三都出现了错抄现象,上图本中的文本原序应为叶三 a、叶二 b、叶二 a、叶三 b,静嘉堂本和辽图本中的文本原序

^①误录文本自“逡巡万王拥均台”至“共仰宾筵之秩”。

则应为叶三 a、叶三 b、叶二 a、叶二 b,二者错误完全相同,而不同于上图本。又如三本卷六“改元”“元会”条中虽然都出现了错抄问题,但静嘉堂本和辽图本在卷六“改元”条中还错入了同卷“籍田”条中的部分文本^①,同样也是上图本中没有出现的现象。

尽管辽图本有多处与上图本、静嘉堂本相合,但结合其中异文来看,辽图本实际另有所本。辽图本中常有上图本、静嘉堂本不存的文字,如目录卷八五“青词”下有小字“《翰林志》:‘凡太清宫观荐告词文,用青藤书朱字,谓之青词’”,上图本、静嘉堂本均无;卷三十“户部侍郎”条“荣布蕃宜之政”,上图本、静嘉堂本作“荣□蕃宜之政”等等。此外,辽图本中也有不少独特的缺文现象,如卷七“冬至”条“同望舜□之远”,上图本、静嘉堂本都作“同望舜云之远”;卷三十“户部侍郎”条“逃相□□之□,自笑□□”,上图本作“逃想南湏之连,自笑周飞”,静嘉堂本作“逃想南湏之连,自笑凋飞”等,这些现象都明确指向辽图本与上图本、静嘉堂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。

(二)系统二(浙图本、国图本)

相较于上图本、静嘉堂本和辽图本,浙图本、国图本中虽没有大篇幅的错漏,但也存在多处细节上的共同问题,指向两部抄本为同源关系。

比较浙图本与国图本,二者目录、正文部分的行款一致,多数文本的抄写位置甚至完全相同。其余部分文本位置的偏移亦在数字之内。而二本中的文本讹误,如卷五八“南安军”条漏抄、卷七一“知己”条有文无目等,亦相同。再结合文本比勘,除去少数音形讹误,可以发现,在《四六丛珠》的五部抄本中,浙图本与国图本相同且异于他本的情况比比皆是。例如目录卷三八,浙图本、国图本均误作“监修国史史馆修撰”,他本则作“史馆修撰 监修国史 史官”;卷五“明堂”条摘句,浙图本、国图本作“天神地灵,允协合法之制;祖功宗德,于昭并配之文”,上图本、静嘉堂本作“天神地灵,允协合法之制;祖功宗德,于昭并配之文”,辽图本作“天□地灵,允协合法之制;祖功宗德,于昭并配之文”。可以说,浙图本与国图本之间的同源性是显而易见的。

不过,浙图本和国图本又各自有一些独特的讹误。如国图本卷五七“诸州郡”条中缺抄一叶^②、卷五九“茂州”条中缺抄“故事”部分及其后的

^①误录文本自“曰籍田坛”至“求汉章而既逸”。

^②缺抄文本自“故事:前汉梅福”至“太宗将授录”。

“简州”“陵井盐”条、卷九九《崔舍人挽诗二首》中的第二首诗错入《魏国录挽诗二首》中、卷六五“谢除授”条中错入原属卷六六“谢到任”条共计五叶的摘句^①、卷六六“谢到任”条中错入原属卷六五“谢除授”条共计八叶的摘句^②、卷六七“谢荐举”条中错入原属卷六五“谢到任”条共计两叶的全篇与摘句^③；而浙图本卷五五“幕职官”条中的文本被错抄在同卷的“功曹”条中^④等。其中的一些脱叶、错叶现象或许还可归因于装订环节，但并非整叶的漏抄、错抄，则明显属于各自在底本或传抄阶段产生的独立性错误，足以证明二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。此外，从版本来源上看，两部抄本虽同为天一阁旧藏，但应非阁内所抄。天一阁抄本用纸多为红格、蓝格、黑格，很少用无格抄纸，特别是国图本使用剃改界栏的印纸，用纸相对随意，更似购自阁外的藏本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国图本卷四十叶十三至卷四四叶二靠近天头处有破损，每叶上方1~5字为接纸补写。比勘补写文字可以发现，国图本补写的文字基本与浙图本相同，而不同于其他抄本。例如，卷四二“光禄卿”条，国图本原作“□□亦以此称之”，补写“大宗”二字，浙图本同，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辽图本皆作“太宗”；卷四三“大理少卿”条，国图本原作“武侯执□□，□□悉斩之”，补写“以闻上令”四字，浙图本同，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辽图本作“以法上令”。由此可见，国图本补写所据底本应与浙图本同属一个抄本系统。而在卷四二“大理卿”条中，国图本原作“□□□□详刑”，补写后三字为“丹笔之”，浙图本作“杭丹笔之”，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辽图本作“伉丹笔之”，似乎又说明，补写所据底本较浙图本为后录者。

综合上述情况可知，现存《四六丛珠》抄本的两个系统中，同一系统内各抄本间既有同源性，又有独立性，彼此间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。

然而细细比对，两个系统中又存在三处相同的连续缺文，似能说明它们拥有同一祖本。其一，在五部抄本中，卷九一“修造”条的同一位置都存在连续五叶的文本残缺，其中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浙图本、国图本残缺情况完全一致，且所缺文字位置多靠近版心^⑤，所存文字即使已不成句，仍

①错入文本自“误膺明诏”至“复切宠除”。

②错入文本自“宜有通习该洽之妙选”至“莫伸九顿首之礼”。

③错入文本自“考课边城”至“在所驱策”。

④错入文本自“泛绿水依美蓉人”至“吏事肃清”。

⑤上图本、静嘉堂本中前三叶残缺文本靠近版心，后两叶残缺文本不在版心周围。

静嘉堂本卷七七《上提举小简七幅》一文中,原应作为注释的小字被抄作大字(划线处):“候问之诚,谨具前幅。此两句在第二幅,近时士大夫多于第一幅使叙述,为前已有公状两纸也。”此句在上图本和浙图本中亦存在相似讹误^①,上图本作“候问之诚,谨具前幅。此两句在第二幅,近时士大夫多于第一幅使叙述,为前已有公状两纸也”;浙图本作“候问之诚,谨具前幅。旧此两句在第二幅,近时士大夫多于第一幅便叙述,为前已有公状两纸也”。可以猜想,此类讹误应是由于底本中的大小字区别不明显,抄手又未能理解文意所致。倘若底本为刻本,字号大小差异明显,这种讹误恐怕不会产生,故其底本更可能是字号区分不明显的抄本。

同样,在上图本卷六二“爵封食邑”条中,本应均作大字的题目“爵封食邑”^②，“食邑”二字被抄为小字,作为“爵封”的附属,显然是抄写之误。从逻辑上来说,这样的讹误同样不应来自于字号大小分明的刻本,而更可能是由于抄本字号不严谨导致的转抄失误。类似的情况,浙图本卷五四“诸司属官”条摘句“暂淹漕幕,虽未究于设施;遄奉宸纶,当别膺于超权属并漕”中,作为附注的“并漕属”三字,原应以小字书于摘句之下,“属”字却作大字写在摘句下联末(见图6),可推知底本中“并漕属”应作双行小字“并漕/属”,因位置相近,“属”字被误抄入大字摘句下联之末。这种讹误同样指向其所据底本更可能是字号区分不明显的抄本。



图6

尽管各抄本直接依据的底本未必为刻本,但在五部抄本中仍保留有多处宋刻本的痕迹。

其一,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浙图本、国图本的目录末均录有“建安陈彦甫/刻梓于家塾”^③双行刊记,与宋刻本中常见的板状牌记式样十分接近。

其二,在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浙图本、国图本中,常提行抄录如“户侍”“户侍户部郎中”等细目标题,浙图本的部分卷内除细目外还抄录了干支页码,如卷三五有“观文 资政 庚下一”“资政 龙图 庚下二”“天章 庚下三”等,为他本所无。这些细目标题,在上图本、静嘉堂本中均占

^①此句在辽图本中均作小字抄写,国图本中字号无误。

^②此四字在其他抄本中均以大字抄写,在上图本的目录中也作同等字号。

^③陈彦甫,生平不详,其名仅见于《四六丛珠》刊记,当为南宋建安地区刻书者。

行抄写,浙图本、国图本中不占行抄写;位置多在一叶的右上角^①,颇似建刻本中常见的板框外耳题。各本虽然并非每卷都抄录耳题,但抄录的耳题常连续出现在同一卷中。统计耳题连续出现的频率可以发现,耳题之间总是相隔 28 行。由于耳题原在板框外,不计入行数,可推知宋刻本应为每半叶 14 行。在现存抄本中,浙图本、国图本亦为每半叶 14 行,行 25 字,可能最接近宋刻本的原有行款。

其三,建本中常以字号和特殊标识来区别内容、突出重点的特点也在现存抄本中有所体现。就字号而言,除辽图本外^②,其余抄本均以大字粗写“总说”“故事”“四六”等小题目,利用字体大小、粗细的变化来分隔文本的功能区域。在静嘉堂本、浙图本(见图 7)的“故事”中,还以大字粗写部分短语,使重点内容变得更加醒目。而就特殊标识来说,《四六丛珠》刻本中具有装饰意义的指引记号也在现存抄本中有零星留存,如小题目“全篇”,在上图本卷八“措刑”条、静嘉堂本卷六二“爵封食邑”条、浙图本卷二五“起居郎起居舍人”条和卷九五“圣节大燕”条等均画有单线墨框,浙图本卷四一“正言”条则画有双边墨框(见图 8),样式与同为建刻类书的《新编方輿胜览》(见图 9)^③等书中圈示小标题的装饰相似;又如小题目“故事”中每条故事前的墨圈“○”,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浙图本、国图本中有多处保留^④,这一形式同样见于《新编方輿胜览》;又如弧线,国图本卷七四“双封封皮式 启事内封皮式”“大状小筒内封皮式”中,套式内的文本上画有弧线(见图 10),可能用以表示小筒中内封、外封的连接,这种样式亦见于建刻类书《诚斋四六发遣膏馥》(见图 11)^⑤。

①浙图本、国图本中均在每叶右上角,上图本中多在每叶右上角,静嘉堂本中所在位置不一。

②辽图本中以小字抄写小题目。

③祝穆辑:《新编方輿胜览》卷十六,上海图书馆藏宋咸淳三年(1267)刻本(索书号:786975-94),叶十二。

④见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浙图本、国图本卷九“祥瑞”条、卷十“皇太后”条;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浙图本卷十七“贺启头”条;上图本、浙图本卷三八“监修国史”条。

⑤周公恕、陈范编:《诚斋四六发遣膏馥》续集卷五,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刻本(索书号:404·71),叶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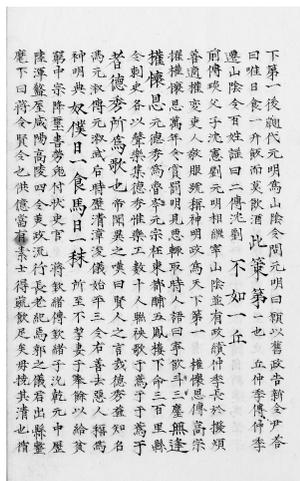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7 浙图本短语大字粗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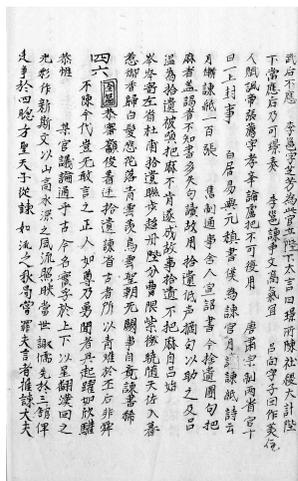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8 浙图本小标题双边墨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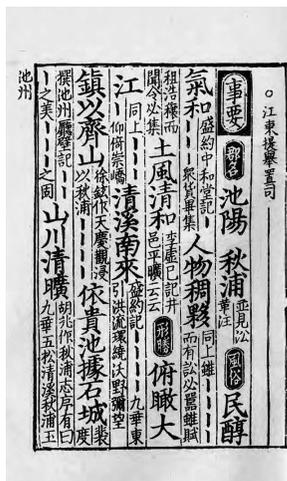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9 《新编方輿胜览》小标题墨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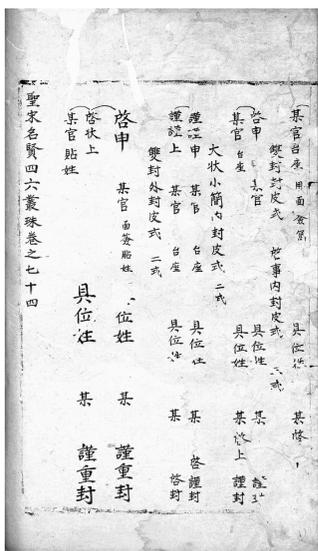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0 国图本弧线



图11 《诚斋四六发遣膏馥》弧线

宋刻本中使用耳题,与蝴蝶装的装帧形式密切相关,正是由于耳题在蝴蝶装中位于翻口一侧,其索引功能才得以发挥。《四六丛珠》抄本中保留的右耳题,提示这部书的宋刻本应为蝴蝶装;然而在祖本中出现的大面积残缺,却都对称性地围绕在版心周围,更像是容易发生在包背装书籍上的损伤。推测原因,或许祖本为蝴蝶装,在后世流传中被改装为包背装,并在后续收藏过程中产生了此类集中于版心的磨损。

有鉴于此,对于现存抄本的考察与利用,便需依据其版本与文本的具

体情况。就现存五部抄本而言,由于在抄写时代上仅知辽图本可能为明初抄本、国图本可能抄于明中后期,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浙图本难以进一步分出时代先后,故而只能优先从其他条件判断。首先,就各本与宋刻本的接近程度而言,现存五部抄本中,国图本虽为残本,但其行款与宋刻本接近,对弧线记号的保留亦为他本所无,且部分文本的面貌亦更接近宋刻本。如卷七“冬至”的“故事”中“黄鲁直引《唐杂录》云:‘宫中以女二揆日之长短,冬至后日晷渐长,比常日增一线之功’”句,本为文中注释,参照前后文的抄写原则,此处应作小字,但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辽图本、浙图本都作大字,只有国图本以小字占半行格式抄写。因此,国图本虽为残本,不能作为整理底本使用,却仍具有较高的参校价值。且此本中未见底本为抄本的痕迹,可能与宋刻本关系更为紧密,值得留意。

其次,从版本精善的角度而言,辽图本虽然可能是明初抄本,但行款样貌改换较大、文本残缺较同一抄本系统的上图本、静嘉堂本更多,且虫蛀严重,对于古籍整理而言难以称善。静嘉堂本虽抄写精美,但残缺文本较同系统的上图本更多,且抄写时存在擅改嫌疑,除前文所述卷十四补写“谢赐历日”小字以外,又如卷二四“丞相”全篇,上图本中以空格表示文本残损,有“谟合皋陶,言合稷契,□□^①都俞吁咈之间。寿若高宗,俗若成康,皆自辅赞弥逢之用。永□圣,迄致太平。如某者,郑里孤生,韩门旧物”一段。静嘉堂本的抄手大概不解其意,为了使文本在格式上两两相对,径自在文中添加了空格,作:

合皋陶言合稷契 都俞吁咈之间寿若高宗 俗若成康皆自
辅赞弥逢之用永 圣迄致太平如某者郑里 孤生韩门旧物

格式上看似齐整,反而导致语句不顺,颇有画蛇添足之嫌。又如静嘉堂本目录“卷十七启贺启头”下有小字“又元会”,他本均无,大概也是抄手发现正文卷十七“贺启头”条中出现了“元会”条的文本,不知其原为误抄,才在目录中擅自添字,而这些行为都降低了静嘉堂本的可靠性。

最后对比上图本和浙图本。上图本因被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,较其他抄本更为“通行”,书前跋语虽为伪造,却并不影响这部抄本的实用价值。然而从内容来说,上图本中错乱倒置、鲁鱼亥豕之误较浙图本更为常见,加上抄写不够工整,常有文字不易辨认的情况。且在上图本中,凡遇句中缺一二字的情况,抄手多连贯抄写,不保留空缺位置,如卷四九“四

^①上图本此处仅空一格,据浙图本补。

厢都副指挥使”条中,同系统的静嘉堂本中缺字作“蔽江淮,□长城之万里”,浙图本作“蔽江淮,览长城者万里”,上图本则径作“蔽江淮,长城者万里”;又如卷八九“开堂”条中的摘句,静嘉堂本作“一瓶度世,聊随闽岭□困”,浙图本作“一瓶度世,聊随闽岭因缘”,上图本则作“一瓶度世,聊随闽岭困”。这种抄写习惯也影响了上图本文本的准确性。相比之下,浙图本在卷目结构上错误较少,文字正确率更高,行款面貌更接近宋刻本,抄写水平亦在明抄本中属上乘,更适宜作为《四六丛珠》的整理底本。

结语

通过梳理《四六丛珠》现存五部抄本可知,各本均为同一祖本的流裔,其内部可细分出两个传抄系统,系统一包括上图本、静嘉堂本、辽图本,系统二包括浙图本、国图本。五部抄本底本各异,且各自有相当多独有的异文,其内部的传承脉络应比现有的推测更为复杂,中间环节还应有多个传抄本存在(如图 12 所示),且实际数量可能在现有的预估之上。经由对《四六丛珠》现存抄本版本源流的梳理,可以了解这部四六类书在当时的传抄之盛,其在书籍市场中的热度也可见一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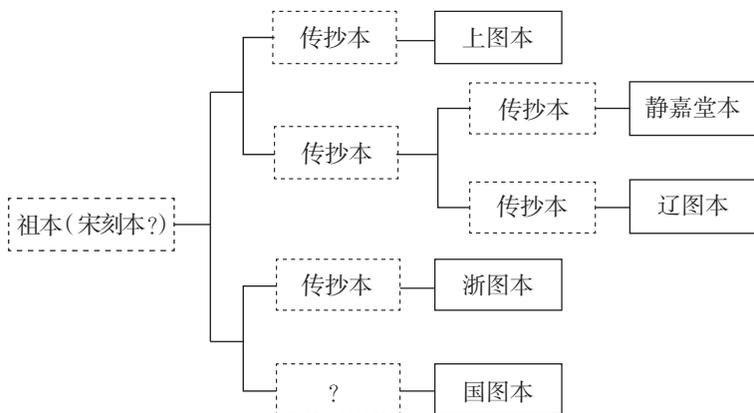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2 《四六丛珠》抄本源流图

笔者调查过程中,曾得到辽宁省图书馆(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)赵长波老师、静嘉堂文库山田正树先生和吉田惠理女士、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老师和刘欣佳博士的帮助,谨致谢忱。

【作者简介】戴琳琳,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宋代文学和古代文章学。